

荒谬

的故事
HUANGMIU DE GUSHI

(上卷)

余易木 / 著

余易木作品系列

《初恋的回声》

春雪

初恋的回声

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

《荒谬的故事》(上下卷)

青海人民出版社



荒 謬 的 故 事

余易木 著

青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2010 · 西 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谬的故事 / 余易木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225 - 03569 - 7

I. 荒… II. 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0787 号

荒谬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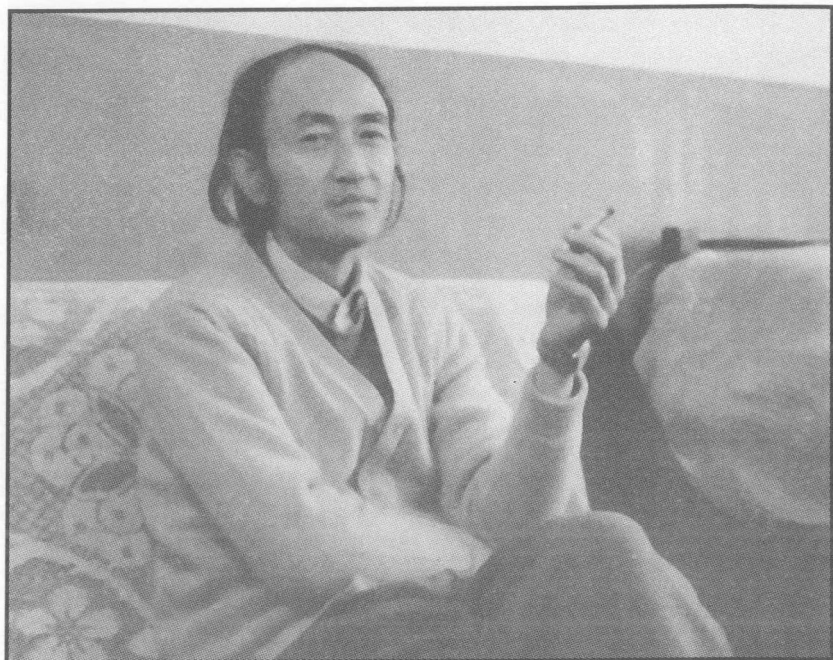
(上下卷)

余易木 著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同仁路¹⁰号)
发 行 :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 (0971)6143426
发行部(0971)6143516 6123221
印 刷: 青海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23
字 数: 612 千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225 - 03569 - 7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80年代的余易木

文坛英才余易木

●张守仁

序 一

—

一转眼，易木兄走了六年多了。带走了身前的凄凉，身后的萧索。只留下《十月》发表的《春雪》和《初恋的回声》，还有一百多万字没有跟读者见面的文稿。

一生悲苦，两袖清风。

今年一月中旬，余易木生前好友邢孔荣先生来信告诉我，他已将余易木骨灰盒从西宁迁回到他的故乡上海。按照江南民间冬至下葬的习俗，安放于市郊嘉定长安公墓祥24 B区第11排第6号墓穴。余易木是笔名，他本名徐福堂，故在墓碑上篆刻了“徐福堂之墓”五个字。

上海是余易木接受启蒙教育的桑

梓之地。这个最早接受西方文明、最早从事现代出版事业、最早翻译和传播《圣经》和《共产党宣言》的东方大都会，像他生前热爱的法国巴黎那样，近代、现当代史上曾经涌现过、工作过众多文化巨人、大作家、大艺术家；像纽约之于美国那样，一百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是华夏先进生产力和现代文明的发祥地。像余易木这样的英才，只能诞生在上海。在这长江汇入浩荡东海的处所，应该是他那终于获得自由的灵魂最理想的安息之地。

我作为后死者，不禁想起亡友在《初恋的回声》最后部分写到的那个情节——当男主人公周冰把他初恋情人梅雁的灵柩迁移到上海虹桥公墓后在她新碑上铭刻的那两行痛惜的文字：

我将去你那儿，
你却不再回来……

二

我这辈子从事编辑、写作、翻译工作已近50年，结识了数百位作家，但像余易木那样天赋那么高、文学功底那么厚、知识那么渊博、精通那么多外语、经历那么坎坷，却在逆境中不迎合权力，坚持真理、坚信未来、坚守艺术良知，始终保持一种高洁孤傲品格的人，实在罕见。

余易木生于上海富商之家，从小就得到良好的家教，少年时代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深受文学的熏陶。解放初，他在上海国立高等机械技术学校学习锅炉专业，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派到大连俄专进修俄文。他很快就能阅读俄文版普希金的诗和托尔斯泰的小说。不久分配到北京第一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当翻译，业务水平被众人称道。1957年余易木因对留苏学生派送办法有所微词而被打成右派。那年他才20岁，就被发配到青海劳动。他在人烟稀少的边陲之地开过荒，挖过野菜，打过机井，拉过板车，用稀糊糊和烂土豆填过肚子。苦役、饥饿、郁悒，过早地损害了他的健康。“文革”初，余易木所在的青海省物资机械修造厂造反派，对他拳打脚踢，强制着给他剃了阴阳头，把他拉到大街上游行示众。那天他回到家里，见室内一片狼藉：衣箱被翻倒，他心爱的中外文书籍被焚烧，小房间里弥漫着烟火。他想不通，自己为何沦落到如此地步！当人的尊严受

到极大侮辱之后，他对这个世界已不再留恋，决定离开它。他扑灭了烧书的火焰，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躺到床上。他内心很平静，想起了法国作家纪德小说中最后一句话：“这件事远比人们想象的要简单。”他回忆自己原本很有抱负的一生，觉得活得实在窝囊。耳鸣渐响，头开始晕起来，意识渐渐模糊了。最后一个念头从他脑子里闪过：“我写的一些文学作品在好友间传阅，将来人们也许会想起我……”渐渐地，他失去意识，昏过去了。半夜，他突然呕吐起来，吐药片碎末，吐苦水和血水。他感到脚渐渐冰凉，冷上去，冷上去，冷过了膝盖，冷过了胸部，他失去了知觉，又昏了过去。昏迷了24小时，他又醒了。他咬咬自己的嘴唇，有点痛。带血的狂呕使他死亡边缘又回到了人间……

三

在这之前4年，即三年困难时期刚过的1962年8月，也就是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那个1962年8月，余易木竟写了一篇凄美的爱情小说《春雪》。字里行间透露出哀怨、痛苦和对“阳谋”的不满。当时他是写给自己看的，秘不示人。这样的“大毒草”只能埋在地下，让它慢慢烂掉。《春雪》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突然出现的政治形势下，已不再相恋，因为他们之间横着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渊——它的名字是：1957。

1957年之夏，男主人公被错划为右派后，此前亲密的女友就和他分手了。分手了，但各自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痛。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他们分手5年后又邂逅。在春雪纷飞的夜晚，这两个从前的恋人之间在路上爆发出一场撕裂心肺的对话——

“难道……难道你直至今今天，依旧不能原谅我吗？”

“原谅？你又何必需要我原谅？在这现实主义的时代，谁不应该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呢？”

“你没有理由说这样的话！没有理由！你不知道我为你流了多少眼泪！你不知道我为你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你不知道我为你忍受了多少内心的折磨！你不知道我为我们的爱情做了多少牺牲！你不知道，在你离开北京那天，我站在车站外面，从清晨一直站到深夜，人家都以为我是一

个疯子！”

“你根本就不愿意让我知道！你甚至不愿意听我说一句解释的话！当你这样冷酷无情地对待我的时候，你想到了我们的爱情没有？你想到了我的眼泪、我的痛苦、我的不幸、我的悲哀没有？我问你，你想到了没有？牺牲？——笑话！你还谈什么牺牲！你牺牲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我的生命——我不幸的爱情！”

“你不相信！我知道，你不相信我的真诚！你不相信我真诚地认为考验的时刻到了！你不相信我真诚地认为革命牺牲爱情的时刻到了！你不相信我真诚地认为你对人民犯了罪，尽管你是我最亲的亲人！你不相信我真诚地认为没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就不可能存在纯洁的爱情，尽管世界上未必有人会像我爱你一样去爱一个人！……现在，我自己也不会相信这种事情了。但是，当时，当时我是那么的年轻，幼稚……当时我根本不懂得，在这时兴着真理的时代里，更多的却依然是谎言！”

一阵愤懑、埋怨之后，他们的情绪平息下来。

男主人公说：“原谅我，我的朋友，假如我使你痛苦的话，我们都是不幸的人。”

女主人公说：“因为我们太真诚。”

男的说：“如果我不太懦弱的话，我想，我应该有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

女的说：“都怪我不好，我伤透了你的心。”

他们身边的雪，越下越大了。破镜已经难圆。女主角轻轻拥抱了他一下，转身离开，和他永别……

余易木即使在那样的岁月，仍然相信未来，所以在小说前面的引言中，他特别醒目地写下了雪莱的那句名言：“冬天来了，春日怎能遥远？”正如诗人郭路生同样写于上世纪60年代的那首《相信未来》的诗歌那样：

“当蜘蛛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四

当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历史有了转折之后,这篇地下小说才以手抄本的形式冒出地面。打成“右派”后发配西宁、改正后回京工作的美术家王复羊把《春雪》带到首都,交给作家从维熙,再由从维熙把它交到我手中时,已是1980年春天了。我看后眼睛一亮,建议立即发稿,安排这篇《春雪》发表在《十月》1980年第3期上。我们尊重作者的意愿,发表时决不改动原稿中的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并在文末署上“1962.8.西宁”的写作日期和地点,以完全保持文本的原貌。作者在小说中引用了一首叶赛宁的小诗:“Не вернуть мне ту ночь Прохпадуго, / не внять мне Моаруги своей, / не слышать ту Неснго отраднуго, / что распевал в саду соловей……”我担心多数读者看不懂,征得作者同意,才在附注中加上我的译文:“回不来了,我那凉爽的夜晚/见不到我那亲密的女伴/听不到那欢乐的歌/夜莺在花园里婉转鸣唱……”

人们知道,1978年8月,卢新华的《伤痕》从上海复旦大学校园墙报上挪到《文汇报》发表之后。作者一举成名,小说获了奖,并在全国掀起了“伤痕文学”的大潮。从此这个短篇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占了一个绕不过去的位置。殊不知远在《伤痕》写作之前16年,余易木就在偏僻的西宁写出了比《伤痕》在思想上更深刻、艺术上更精湛、情感上更激荡人心的《春雪》。如果说卢新华的《伤痕》,写的是张春桥之流在“文革”中诬枉主人公王晓华的母亲为叛徒从而拆散了一对母女,以致在晓华心上烙下了伤痕的话,那么余易木的《春雪》,描绘的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切断了一对恋人之间亲密的关系,从而在他们灵魂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世上有一种伤痛是永难痊愈的,那就是爱的伤痛。

《春雪》从发表至今已有25年了。我吁请当代评论家们再读一遍《伤痕》和《春雪》,仔细比较一下,是否如我认为的那样,《伤痕》写得比较直白、浅显,而《春雪》的境界则更深邃,艺术更隽永,语言更有韵味?

五

《春雪》发表半年之后,余易木从西宁给我寄来了中篇小说《初恋的

回声》。该小说写于1963年4月至1965年4月,其时阶级斗争之弦绷得铮铮作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康生唆使下,报刊上开始对《刘子丹》、《李慧娘》、《红河激浪》、《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小说、戏剧、电影展开了排山倒海、蛮横无理的大批判。众多文艺单位先后传达两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最高批示:“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并于1964年12月开始,在全国城乡开展四清运动,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余易木在众多作家套着意识形态紧箍咒、噤若寒蝉之际,竟大胆描写了周冰、梅雁、杨芸三个知识分子美好心灵的压抑以及他们苦难人生的历程。其情节之跌宕,感情之浓醇,相濡以沫中的心心感应,生离死别时的暗泣吞声,读来催人泪下,悲伤难抑。我看完此稿,立即把它一字不改地编发于《十月》1981年第2期。文末仍署上写作的时间和地点“1963.4.西宁——1965.4.上海”,以珍视文本的原貌。

熟悉新时期文学的人士都知道,上世纪80年代初那几部名震全国且都获奖的中篇小说如我的挚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贤亮的《绿化树》、从维熙的《远去的白帆》都写到了三年困难时期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馑。张一弓笔下那个钢铁汉子李铜钟率领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兄弟冒着生命危险开仓赈灾的情节,张贤亮笔下那个饿得皮包骨头的章永磷在稗子充饥的年代得到马缨花送给他一个白面馒头时流下的感动的泪滴,从维熙《远去的白帆》里瘦高如长脚鹭鸶的主人公黄鼎饿得眼冒金星时伸手抓住灯光下的蝼蛄往嘴里填塞的场面,都是令人难忘、刻骨铭心的经典细节。比这几位著名作家早写15年、近20年的《初恋的回声》里,当男主人公周冰在青海湖边刚察垦荒地上,饿得浑身浮肿的时候,女主人公梅雁送给他四两粮票,让他买点土豆充饥。在粮食等于生命的日子,里赠送四两粮票,那是何等的慷慨。梅雁和周冰之间由怜悯而同情、由同情而相知、由相知而相爱了。梅雁劝周冰别过分不修边幅、落拓不羁,给他买牙刷、牙膏,希望他坚持刷牙;给他买梳子,叫他梳理头发;给他织绒

线衫、买食品、疼爱他身体、保护他在西宁的冬天免受饥寒之苦……经过几十天相处，他们如胶似漆，成了贴心的知己。但梅雁是有夫之妇，尽管周冰深爱着她，感激她给予他的温暖和柔情，但毅然地、理智地叫她回到内地自己丈夫身边去。他们依依不舍地别离了，别离在他们相识的地方。梅雁回到并不关心她的丈夫那儿，因为意外事故，永远告别了周冰，告别了这个世界……

《初恋的回声》发表之后，读者反应异常强烈。北京有一位教音乐的女教师，向编辑部询问余易木的地址，以便向他倾诉她的感动之情。因我当时在外地出差，她也就不能和作者立即联系上，以致一夜无眠，垂泪不止。成都有一位住院的患者，在医院里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反复阅读。他认为《初恋的回声》是他一生看到过的最好的小说。他曾经想当作家，读了这部作品之后，觉得自己毕其一生心血都很难写出接近、更别说超越这部小说的水平，便主动放弃了写作的念头。他被余易木艺术上的娴熟、设计悬念的精巧、驾驭文字的功夫、刻画人物的细致以及体现在人际关系之间的人性之美、道德之美所征服。当时有不少青海省内外女性读者，看了作品，心灵受到强烈震荡，怀着崇拜心理，纷纷写情书给作者，愿许终身。余易木一一婉辞。其中有一位来自龙羊峡、年轻漂亮、酷爱文学的姑娘，执著追求，锲而不舍，终于与易木兄建立了一种超越读者和作者关系的恋情，最后结为伉俪。

北京的作家们、编辑同行们遇到我，好奇地探问：“这匹驰上文坛的‘黑骏马’来自何方？你们是怎样发现他的呢？”京都名家众口一词，对他高度赞赏。尽管只发表了一个短篇、一个中篇，他就加入了青海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并荣任了1984年青海省国庆三十五周年优秀文学作品奖的评委。当时青海省文联决定调余易木当专业作家，他坚辞不肯，认为一旦成为作协体制内的人，写遵命文学，就不自由了。

中国西部高原青海，除名诗人昌耀之外，又升起了一颗更亮的文学之星。它的光芒不仅烛照着青海，也烛照着大江南北。不久，北京出版社出版优秀短篇小说集时收入了《春雪》，集子就以它命名。广西漓江出版社选择“五四”以来国内经典爱情小说结集出版时，将《初恋的回声》编进

集内并作为该选集的书名。当时《十月》仅在国外就发行两千多册，余易木的名字很快被海外有识人士所传诵，并将他的小说作为英美有些名牌大学东亚系研究生的教材……

六

尽管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部队军校里当过五年翻译，尽管我在京、津、沪文艺出版社出版过几部经典作品的译著，尽管我到北美、欧洲、俄罗斯探亲或旅游访问，能用我的外语能力与人交流，但和我的上海同乡余易木交谈起来，会突然发觉我的外语水平不如他，常有羞愧之感。后任上海作协主席、主编过《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诗人兼学者罗洛先生，因为胡风问题在西宁呆过多年，就曾对当地著名作家陈士谦称赞过余易木，说他“是个很有学识的人，精通德语、英语、俄语”。罗洛出版他的译著《法国现代诗选》时，在“译序”中以感谢的口吻提到过“部分译文蒙余易木同志校阅”的话。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余易木和陈士谦接到中国作协邀请函，安排他们去北戴河“创作之家”休养，路过北京时，他们特意到北三环中路北京出版社宿舍楼看望我，我们得以第一次见面。

余易木生于1937年，当时还不到50岁，可艰难岁月已把他摧残得十分苍老，头已歇顶，只剩下一绺头发，背也驼了，但他目光炯炯，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闲谈中不时闪烁出智慧的火花。我这才知道他一生迷醉于法兰西文学，特别欣赏傅雷先生的译文。提到司汤达(Stendhal，也译斯丹达尔)时，他不无得意地说：“在西宁我细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马修道院》的译本，发现译文不符合我早年读过的法文原著的风格，便托青海图书馆的一位好友，从北京图书馆内借出原著寄到西宁。我专门译出了书中著名滑铁卢战役的华彩篇章，交给一位原在上海工作、后被贬到青海、精通法语的天主教神父作鉴定。神父比较之后，肯定了我的译文，说只有我这样翻译，才能保持原作的风格。”

法语，余易木是从小自学的，解放后又向一位因有所谓历史问题而不受重用的法语专家苦学了两年，终于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

余易木的童年、少年，是在教育发达的上海度过的。解放前上海有的

学生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习英语了。他像个神童,竟然能背字典,很早就看英文文学名著。我和他谈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时,其中那句名言:“Man is not made for defeat. 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人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他不假思索,就流利地用原文背了出来。

一谈起文学艺术,他兴致勃发,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他说:“艺术鉴赏力,与其说是学问,不如说是天赋。只有熟读众多世界名著,像王国维论及境界时所说,‘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你才能眼高视野宽,鉴别哪些是传世之作,哪些是应时之作。我认为像《红楼梦》、《史记》、《雷雨》、《故乡》、《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莎士比亚悲剧、《蓝色多瑙河》等经典作品才能称得上不朽,它们经得起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历史长河的筛选。而目前一些阿猫阿狗都称为名家的人,不用几年、十几年,就会被岁月所淘汰,被读者所遗忘。”

余易木很关心我在《十月》上编发的作品。1986年我签发了一篇题为《人的魅力》的短篇小说,描写的是肖洛霍夫在高尔基陪同下去见斯大林。交谈中肖氏竟和这位大人物争论起《静静的顿河》来,吓得大文豪高尔基忐忑不安,面如土色。易木兄看了小说就于那年7月4日写信给我,委婉指出文中两处地方有误:“一、1929年~1931年期间,斯大林的军衔好像不是‘元帅’;二、单用父称,似乎不合俄国人的习惯。”同时提醒我,人是复杂的,肖洛霍夫后来叫斯大林“роАнойотеч”(亲爹),如能多侧面地写肖,作品会更耐人寻味,更有“魅力”。他年轻我几岁,却比我高明、细心。

俄语是他的强项。他在大连俄专学习期间,该校俄籍教师鼓励学生与苏联青少年通信,以提高俄语水平。余易木和一位名叫наташа(娜达莎)的苏联姑娘,保持有多年的联系,互赠节日贺卡和礼物,互相介绍各自的学习心得,一直到中苏交恶才被迫停止。《欧根·奥涅金》、《安娜·卡列尼娜》、《猎人笔记》等经典作品,他只看原著,不看译文。他说:“吃别人嚼过了再吐出来的蹩脚东西,没有味道。”

易木兄在西宁,有两个好友:一个是毕业于厦大电机系的杨逊,一个是毕业于西安交大电机专业的林哲民。这两位高材生也是被划为右派后

贬谪到青海的。他们三人惺惺相惜，患难中互帮互助，情同手足。“文革”初期还被打成青海省物资局的“三家村”，不许他们串联，但三人打着暗号仍有秘密往来。徐福堂用“余易木”这个笔名，就是由“徐”、“杨”、“林”三个姓氏中的右偏旁组成的。

上世纪60年代初，林哲民、杨逊背着人潜心研究，写出了一篇当时处于领先水平、关于“裂极式三相同步交流电动机”的学术论文。他们因国内刊物不发右派文章而苦恼不堪，余易木便自告奋勇，把它译成了俄文，将译稿径寄莫斯科，投给苏联科学院主办的权威刊物《электричество》（《电》）。该刊主编ВольАек：（伏尔杰克）审读之后，欣然回函，表示同意发表。只因随后中苏谈判破裂，关系紧张，该论文才未能刊出。

笔者撰写本文时，恳请退休后回到奉化居住的林哲民把余易木的翻译底稿复印一份寄我一阅。看完长达18页用词精确、逻辑严密的科技译文，我既佩服又惊叹，易木兄的俄语修养，无论是文艺方面或科技方面，都达到了庸常之辈如我者难以企及的程度。

谁能料到，余易木和苏联姑娘娜达莎长期通信、擅自寄稿给莫斯科《电》杂志这两件事，在“文革”中竟变成了诬陷他是苏修特务的“确凿铁证”。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公安部门才对此案不了了之。

七

余易木同时是一流的高级工程师，从理论到实践，都表现出众。当林哲民、杨逊遇到了圆锥齿轮公法线长度不好算的难题请教他时，他的脑子像电脑似的好使，立即建议他们参考捷克人计算时使用过的公式。他们得到了启发，根据啮合原理，推导出精确公式，算出了理想的结果。和余易木共事30多年的厂长赵伯勋告诉我：“工程师在机械制造中常用的公差表，数字异常庞大，徐福堂居然能背出来。谈到工程技术方面的数据，一旦谁说错了，他立即给予纠正。”为了推出一个新产品钢模板，赵厂长和徐福堂到西安、北京走马看花参观了一下，福堂兄就胸有成竹，回西宁后很快试制成功，使工厂很快扭亏为盈。徐福堂一生固守清贫，即使外单位用高薪聘请他，他也不愿另攀高枝，说：“正是修造厂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走了，那就不仗义了。”

余易木还是一位有超常能力的预言者。“文革”之初，他和青海省物资局局长关在同一个“牛棚”里。局长感到前途渺茫，消极悲观。余易木就安慰他：“将来大部分干部总是要解放出来工作的，而且据我判断，你会比我早几年走出‘牛棚’。”后来运动的进程，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见。

“文革”中正当江青红得发紫、飞扬跋扈、挟天子以令诸侯之际，余易木对知己的人预言说“这个张狂的女人将有最悲惨的下场”。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邓小平被批成“中国的纳吉”下台，他坚信邓小平还有回到政治中心舞台上为中国人民做事的机会，时间不会太久，劝朋友们耐心等待。他的预言，果然被其后的历史一一应验。

正因为有洞察历史风云的特异能力，余易木从不低头认罪。即使在思想异常禁锢的时期，当绝大多数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们夹紧了尾巴，用苦役改造自己的时候，易木兄还能在逆境中挺直脊梁，坚持自己的艺术观，酣畅淋漓地描写苦难、悲戚的爱情小说，哀叹真、善、美的毁灭。其稀有程度，犹如在冰天雪地、朔风凛冽之中的枯枝上，尚有一只黄莺儿鸣唱起了凄美、多情的歌。真可谓大音希声！因此，《春雪》和《初恋的回声》的重要性，难道不是和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文学中爱伦堡的《解冻》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作品具有相同的价值和意义吗？我认为，余易木在阶级斗争剑拔弩张的岁月，漠视权贵、呕心沥血写出的这两部作品，由于其艺术质量峰值之高，不仅在上世纪60年代国中无人能与之比肩，就是放在新时期繁荣以来众多获奖的中、短篇小说中也毫不逊色，且仍能显示出它们卓异的光彩。可是当代评论家们、文学史家们从不对余易木的作品议论几句，或记上一笔，一直保持高度的沉默。这是有意的绕过呢，还是无意的疏漏？这是否反映了当代文学评论家们研究的视野因忙于热门话题而过分狭窄呢。还是因为缺乏独立识见而产生的跟风、从众心理在作祟呢？笔者孤陋寡闻，在此就教于方家。

八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出差到中国西部组稿，曾专程去西宁小桥大街9号拜访易木兄。那次造访，我极想看看他在“文革”中躲开众人写出的那部7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荒谬的故事》的手稿。我央求多次，未能如愿，便

遗憾地回到旅馆。次日清晨,我计划穿过柴达木盆地,经过冷湖去敦煌。余易木早早地用网兜提了苹果和蛋糕到长途汽车站给我送行。我和他握手告别时,见他身子消瘦,颧骨高耸,头发更显稀少,便叮嘱他:“别过分辛劳,身体最重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点点头,挥手送我登上长途之旅。谁知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那次回京后,我忙于种种编务,或参与张罗给众多青年作家出他们第一本处女作,或担任诸多文学奖评委,或责编八卷本的《从维熙文集》,总是忙忙碌碌,只能偶尔跟余易木打电话、通通信,互相问候一下。从不多的联系中得知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了。有一次我到中国美术馆看画展,偶遇余易木好友——北京漫画家协会主席王复羊。他告诉我:“余易木去世了。”我得此噩耗,大吃一惊。后经多方打听,余易木生前在西宁的好友左良(青海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杨逊(青海大学教授)、陈士谦(青海省文联副主席)、王贵如(青海省文联主席)等人详细告诉我——

1998年初,余易木因肺部感染引发心脏病,住进青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部。因为生前抽劣质烟过多,肺部照片已拍不清晰。几十年来过重的劳役、过多的磨难、过分的节俭(经常以馒头、点心、方便面充饥)所积累下来的伤病,已使他形销骨立、羸弱不堪,最后因“心肺衰竭”于1998年8月18日下午6时30分过早地走了,年仅61岁。

去世后友人们前往他住处帮助整理遗物,发觉他家中清贫如洗,家具破旧,连像点样子的替换衣服都找不到,只得临时派人到街上买了一套“老衣”,给他洗净了身子穿上。儒雅有礼、博学多识、情操高洁若余易木者,竟是这样一种“文章憎命达”的身世!见此情景,朋友们莫不泫然泪下。

因为女儿为父亲办完丧事后要到南方上学,故她在叔叔、伯伯帮助下,从一只旧柳条箱中把父亲生前整理抄写好、尚没有发表的《荒谬的故事》等遗稿取出来,封存到一只向青海省工商银行租用的保险箱里,以便妥为保管。

朋友们将凌乱的屋子收拾一下作为灵堂。陈士谦拟了一副挽联“难忘《春雪》霏霏争奈斯人独憔悴,犹听《回声》咽咽哀哉秀木竟先摧”以及

横批“美文长存”。由青海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林惜醇书写后挂在灵堂上祭奠。那天到灵堂吊唁的有机碱修造厂的干部，省作协的代表，还有零零星星几位文友。余易木遗体于8月20日火化。一切遵照他临终前的遗嘱：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只有逝者生前几位好友、厂里几个同事和遗孤为他肃穆送行。当遗体推下灵车，送进火化炉之前，亲友们饮泣着看他最后一眼，又轻轻放上几束鲜花，默默祷祝，让芳香的花神陪伴他英灵驾鹤西去……

乙酉新春，笔者但愿文学奇才余易木不被人们忘记，让他在当代文学史上能获得一席他应有的位置！

阿门。